

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路径与现实选择

——基于“公民身份”的思考

李 艳 霞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西方福利国家遇到了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 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使福利国家进入了“后福利”的时代。在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改革与反思的过程中, “公民身份”(citizenship) 进入了理论家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并引起广泛关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公民身份危机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凸显出消极的后果, 福利国家所处的两难困境就是这种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权利的危机与制度的困境暴露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局限, 而公民身份的拓展与延伸在挑战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 也将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开辟出一条崭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公民身份; 参与权利; 后福利国家; 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12; D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 - 4721(2007)03 - 0163 - 06

所谓“后福利国家”并不是有着严格内涵与外延的学术名词, 它仅仅是一个从时间的维度相对于福利国家的概念, 代表着福利国家的未来走向, 是福利国家转型的目标。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福利国家危机, 寻找危机根源、创新社会政策一直是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的努力方向。在技术层面的改革措施收效甚微的状况下, “公民身份”(citizenship), 这一福利制度建立的价值根基性概念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从公民身份出发, 向上审视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局限, 向下关注社会政策的理念与措施调整, 成为福利国家摆脱困境的重要理论与现实路径。

“公民身份”(citizenship) 是现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近代以来, 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公民身份体系大致包括市民权利(civil right)、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和社会权利(social right)。这三种权利的取得不仅赋予了公民与国家对话的能力, 标志着公民对国家依附地位的摆脱, 更为重要的是, 每一种公民身份的取得都直接引发了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公民市民权利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宪政制度的成熟, 政治权利的取得带来了代议民主制度的完善, 而公民社会权利的确立更是改变了国家传统的“放任”政策, 直接导致了“福利国家”的产生。可以说, 资本主义国家重大制度设置的背后, 都有着公民身份的强大支撑, 任何制度的调整都体现了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微妙变化。对于福利国家而言, 当前的制度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民身份危机, 而公民身份的危机也进一步暴露了近代自由主义理念的固有局限。这一制度 - 权利 - 理念的逻辑链条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困境的根源及必然性, 也为福利国家今后的政策走向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路径选择。

一、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道德回溯: 福利国家摆脱困境的理论路径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 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公民身份模式, 不同的

收稿日期: 2006 - 07 - 10

作者简介: 李艳霞(1976 -), 女, 吉林辽源人, 法学博士,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基本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

公民身份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在现实的制度设置中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却都有着共同的根基,那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了当代公民身份实践的要素。但是,公民身份的三种组成要素之间并非完全和谐一致,尤其是在市民权利和公民社会权利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使二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对公民社会权利的强调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以财产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市民权利,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便是对于市民权利尤其是公民财产权利的强调,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公民的市民权利与社会权利的矛盾几乎无法调和,而且二者之间的斗争往往以市民权利压制社会权利为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福利国家的困境和公民身份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在近代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现代公民身份的危机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直接相关。在不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当代西方社会寻求解决公民身份危机的基本路径是回溯到古希腊的道德型公民身份理念中去寻找思想资源。近代公民身份与古典公民身份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非道德性。单从社会物品的分配领域来看,近代公民身份更为注重在不损害他人自由的范围内,以交换的形式获取社会资源和机会,而不是以“应得”作为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标准。在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近代公民身份中,没有把道德上的差异作为其理论的内容,道德因素并不是决定社会资源分配的标准,这必然造成长期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处境最差的人会处于这个位置?是归因于不幸还是个人的失败?如果不考虑道德上的优点和缺点来分配资源,又怎能保证道德沦丧的人不会以邪恶的方式使用分配给他们的资源?虽然法律的约束可以防止许多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是法律与道德之间仍然有着许多空白地带。近代公民身份在国家领域的事务中,把人类的恶劣本性预见得淋漓尽致并在制度上加以预防,但是在经济领域,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公民身份却把人类的恶劣本性忽略了。“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缺陷是它对邪恶和缺德的天真。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相关的事实或试图无视它们。而是说,他们让这些事实迁就他们的政治道德的尝试是完全无效的。”^[1](P268)]近代公民身份的这种无视道德的特点导致了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在其经济领域中,许多恶德——自私、贪婪、恶意、嫉妒、好斗、偏见、冷酷、猜疑等——并不能成为影响社会分配的因素;相应地,许多美德在社会分配领域也同样得不到应有的褒奖。于是,公共空间的公民身份出现了危机,人们的公德水平下降,集体意识淡薄。单子化的个人主义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封闭在小团体的狭小范围内,不关心公共事务,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充斥在整个社会生活之中。体现在福利国家中便出现了富有者以市民权利为依据拒绝为减轻社会不平等而努力,贫困者则依仗国家的福利政策不思进取,产生“福利依赖”现象。福利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公民身份的危机,而公民身份危机的根本原因则是近代公民身份的道德困境。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问题,解决公民身份危机问题,关键还在于解决近代公民身份本身的局限性问题。至此,可以看出当前公民身份拓展的基本方向,就是在近代公民身份中融入道德因素,融入义务和责任的要素。“在战后的政治理论中,民主和正义是理论界讨论的基本概念,公民身份通常是作为民主和正义的衍生物而存在,然而当前的政治现象表明公民身份必须以一种独立的身份在多元的政治理论中突出出来,并且塑造责任性公民身份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一项紧迫的任务。”^[2](P300)]

“公民身份”(citizenship)在国内理论界大致有三种译法,即公民身份、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本文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采用“公民身份”这一译法。

这一界定起源于1950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社会学家T·H·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纪念英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年会上所作的题为《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的报告。关于三种权利的具体分析,参见拙文《公民身份理论内涵探析》,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

详见拙文《公民身份理论内涵探析》,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

二、参与权利: 公民身份的现实拓展

公民身份是一个不断拓展的概念系统, 这种拓展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推动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历史上每一次权利的拓展都必然带来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 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的公民身份危机以及福利制度困境, 不仅为公民身份的进一步拓展提出了要求, 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场所。

所谓参与权利, 就是指国家为公民参与市场或公共组织等私人领域而创设的权利。正如政治权利是公共行动权一样, 参与权利是国家保证的私人行动权。它包括个人和群体通过对市场、组织和资本的某种监控措施, 参与私方决策的权利。从活动角色和参与的方向来看, 参与权利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在非直接参与层面, 政府可以被授权干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 以增进公民的权益, 这也是最弱意义的参与; 在直接参与权利方面, 工人、客户或顾客有权帮助组织市场或者作出决策, 有权让其他自治团体中的委员参与管理; 在群体参与权利方面, 一些以自治为特征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主要角色活跃于社会生活领域之中。群体参与是介于直接参与和非直接参与之间的一种折衷选择。总之, 如果说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政治民主的体现, 那么公民的参与权利就是社会经济民主的体现。从作用的领域来讲, 参与权利与公民的社会权利一起构成经济民主的核心。从公民活动的主动性来看, 公民的市民权利和公民的社会权利属于公民的被动存在地位, 或者说是公民应有的权利, 而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的参与权利则是公民的行为和身份, 是公民创造的权利。公民参与权利的产生, 就是为了消除在公民社会权利中由公民被动的接受者地位所产生的不良社会后果。从公民的主动地位方面来讲, 公民的参与权利的出现, 使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从单纯的政治选举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如教育、就业、住房和保健等等。这种参与领域的扩大不仅能够增加公民对社会的归属感、责任感和公共意识, 提高公民的公共道德, 而且更能够缓解西方社会由于社会不平等而产生的社会排斥现象, 提高公民的社会融入程度。长远地看, 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增加了公共事务中公民决策的成分,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公民身份中市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冲突, 缓解资本主义社会代议民主制度的代表性危机。此外, 对于公民来说, 公民的参与权利不仅是公民的一种权利, 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维护个人权利不仅是维护个人的尊严, 更是维护那些使人们生活得更富有价值的活动和关系。因此, 公民参与权利拓展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公民身份, 从而使公民的权利在个人和集体之间、权利和责任之间达到了统一。

公民参与权利的出现以解决公民身份危机为出发点, 但在根本意义上也是对近代公民身份中道德缺失的一种补充, 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超越。在以实现现代性为目标的思想体系中, 人在更大程度上被看成是一种经济动物, 经济动机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因。这种价值观的前提是认为人首先是一个被动的享乐接受者, 因此, 大部分的公共生活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假设: 为了满意的生活, 接受型价值是唯一的、绝对必需的。这就是那种把世界看成由被动的、无生命的物质所组成的现代世界观。公民的参与权利之所以是对现代世界观的超越, 是因为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假设: 人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物, 每个人都体现着创造性的能量; 人类的行动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所驱动, 不仅有接受型价值, 还有成就价值、自我实现价值和奉献价值。由于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 所以为他人作贡献也是我们的需要。例如, 现代的接受型价值观认为, 只要工人能够得到足够的工钱而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 他们就会满意。但是在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的社会现实却表明, 那些接受国家失业救济和各种保险的人仍然会由于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产生一种被社会排斥的感受。公民参与权利则认为, 工人不仅仅是“工人”, 他们首先是人, 是一个需要实现多种价值的人, 因此他们需要从工作中获得某种满足感, 需要创造性地行事, 需要感觉到他们对社会作了自己的贡献, 需要参与公司的决策程序。

由此可见, 公民的参与权利与其他公民身份的区别在于, 其他公民身份体现了一种接受型的价值观, 强调的是单一的个人, 而公民的参与权利强调的重点在于社会中他人对个人的影响, 至少理论上是如此。这样, 公民的参与权利就把社会或者说是共同体提高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国家的社会政策也应当承认社会既有的重要性, 并且进一步去鼓励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的发展。

具体来讲,公民的参与权利意味着国家应当承担责任为其所有的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意味着工人应当对影响他们生活的政策拥有发言权。在政治上,人民不仅具有权利,而且也应当是权力的拥有者,并且社会应保持警惕和采取措施,以确保能够及时听到人民的呼声,确保社会结构能够得到经常的修正,尽可能使各方面的成员得到真正的参与。因而,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必然带来社会强势民主的产生。从当前福利国家所遭遇的困境来看,公民参与权利的出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但是公民的参与权利是对公民社会权利在社会公正方面的补充。正如大卫·雷·格里芬教授所说:“强调参与胜于公正,并不意味着公正是不重要的。相反,问题恰恰是,只有当人们有机会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时,公正的目标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不过对参与的强调,会使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事物方面,而不是放在旁观者看来似乎公正的东西上面。”^[3](P159)]在此意义上,参与权利的出现使公民身份由原来的静态的被动的公民身份转变为动态的主动的公民身份。

三、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趋向

社会福利是实现福利、克服贫困和谋求发展的总和。现代社会中各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大体上也都是围绕着上述目标进行设计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何谓福利?何谓贫困?何谓发展?随着公民身份中公民权利的拓展以及义务和责任内容的增加,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因此,社会福利的内涵和社会政策的目标需要重新定位。

(一) 福利:收入与生活质量

“福利”的字面意义就是“好的生活”,“美满的生活”,“安乐的人生之路”。那么这种“美满的生活”应如何定义?它包括哪些要素以及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目标?“二战”之后,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最初,人们将福利等同于物质上的富裕程度,因而经济增长成为评价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发现单纯以经济增长来衡量福利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我们用收入和商品作为我们的福利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各自能够如何使用给定的商品束,或更一般地,我们各自能够如何花费给定的收入水平,关键取决于一系列偶然的个人和社会的状况。”^[4](P59)]也就是说,具有相同收入的人并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福利水平。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个体的差异、环境的多样、社会氛围与人际关系的差别,都可能使具有相同收入的人的福利水平高下不一。处于战乱频仍社会中的富翁并不见得比太平盛世的普通百姓幸福;住在豪华别墅里的人们可能难以体会到邻里互助的快乐。综上所述,以收入作为福利的衡量标准是不准确的和带有局限性的。随着这种局限性的日益明显,衡量福利的标准逐渐由单纯的“收入”转换为“生活质量”。

相对于物质财富来讲,“生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不仅包含了福利的经济内涵,还包括了健康、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影响人们生活条件的非经济要素。总体来看,对于生活质量的界定分为个人福利和社会整体福利两个层次。“个人福利”主要建立在个人对资源支配的基础上。这种资源包括收入、资产、教育、知识、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等。个人生活的外部环境也是实现福利所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它决定着个人对资源的利用和个人活动的范围。对“生活质量”的这种界定主要关注于人们满足需求的能力,也就是说应从个人能力的角度来评价生活质量。测量个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不是实际获得的各种效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而不同的效用对于不同个人的意义可能是大相径庭的。重要的是个人是否有能力获得对他而言具有较高价值的效用,或者是否能够拥有其所需要的生活方式。所谓“社会整体福利”,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萌生出来的生活质量分析框架,其中主要包括“社会凝聚”概念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社会凝聚与社会排斥相对,它关系到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包括共同的价值理念、认同感、归属感、相互信任以及减少差别等内涵。这一概念的出现与近年来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下广泛出现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穷、失业和社会公德水平下降等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凝聚本身就蕴含着减少差别、不平等、社会分化现象的意义,这些现象的消除也是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即福利水平的重要内容。至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按照

世界银行提出的自然、生产、人力和社会四种资本模式,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指在不损害人们生存、发展所最终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可持续发展主要指改善社会条件,以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追求福利的目的。为了实现这种代际公平,对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和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成为首要内容,这关系到人们社会活动的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指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新的福利体系既突出了社会公平、社会凝聚和团结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公民作为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个人的参与权利和义务。

(二) 贫困: 物资缺乏与能力剥夺

贫困是与福利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理论界对贫困的理解是逐步深化的。但是这些对于贫困的理解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贫困限定于物质匮乏的范畴,认为贫困就是指缺少足够的物质资源,甚至就是指收入水平的低下。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社会问题的不断增多,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增强,以及公民权利的拓展,公民作为一个集合体逐步由国家统治的客体向统治的主体迈进,因而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的理解也增添了许多主动性的要素。“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4](P85)}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地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一些失败等。从这一角度讲,对贫困的研究必须参照人口的、医学的和社会的信息,而不是只根据收入状况来分析。当然,用可行能力的剥夺来概括贫困并不是排除收入的因素,毕竟收入多少对人的可行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之所以引入可行能力的概念,主要是因为其对国家社会政策的指导意义。传统的福利国家通常采取收入转移的做法来消除贫困,这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但是也有使其陷入长期贫困的危险。因为可行能力剥夺对人们所造成的伤害并不是仅仅通过收入转移就能够加以弥补的。这便引出了贫困者自身对于贫困的理解的问题,那就是“褫权”(disempowerment)。褫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社会的褫权,指贫困者相对于他人而言无法获得生计所必需的资源;政治的褫权,指贫困者在政治上既无明确的纲领,也无发言权;最后是心理的褫权,指贫困者自觉毫无价值,消极地屈从于权威,而且这种消极情感已经内化。贫困是褫权的一种形式,而脱贫之道需要通过集体的自我赋权来争取。“可行能力的剥夺”和“褫权”对于贫困的理解可谓如出一辙,二者都突破了仅以物质匮乏来确定贫困的狭隘范围。对贫困的理解的拓宽,关键意义在于其对社会政策的启发,既然贫困是褫权的一种形式,那么消除贫困的根本做法就只能是赋权。从战略上看,作为指导原则的赋权模型是为自我组织起来的以求集体存活的弱势群体而设计的。为此,贫困人口如何获取解决生计问题的能力,即获得可行动能力,必须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提出来。

(三) 经济增长的工具性质

“物质丰裕的生活”并不一定就是人们需要和向往的“美好的生活”,贫困也不完全等同于物质上的匮乏。这种概念的扩展最终带来的是一种发展观和进步观的转变,是对现代社会通行的“经济增长至上”观点的修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就业和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几乎成为人们共同的标准。但是人类发展的经验证明,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相反,有时会带来福利水平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着人类能力的增强,有时反而会带来人类道德的退化。关于财富的工具性质,亚里士多德就曾有过论述:“财富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4](P10)}就个人来讲,财富的有用性在于它可以允许我们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会帮助我们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的自由和福利。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财富对于我们实现自由和福利并不是唯一需要的,很多财富以外的东西也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财富能够解决的。因此财富和自由、福利之间即使有着联系,这种联系也是存在局限性的。

以失业为例,失业对人造成的伤害除了收入上的损失之外,还包括心理伤害,如失去工作动机、技能和信心,增加身心失调和发病几率(甚至死亡率的增高),扰乱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强化社会排斥,以及加剧种族紧张和性别歧视等。这些伤害给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要远远超过收入的不足,这些损失也不是仅仅通过收入的转移支付就能够弥补的。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计算福利的“扩展账户模式”。多年的数据搜集和跨国比较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到一定点后就会停止提高社会福利,事实上,当一个工业社会达到一个富裕发达的状态之后,社会福利的增长率会低于经济的增长率,直至最终变成一个负值。”^{[5](P57)}可见,经济增长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治愈贫穷、失业、债务、通胀、赤字、污染、匮乏、犯罪、离婚和吸毒等社会问题的想法,在大卫·雷·格里芬看来就是患了经济“增长癖”。以此为标准来对国家的发展进行衡量和判断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有害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4](P36)}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发展,“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4](P10)}。

对于福利含义的重新定位,对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福利制度设置的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当前对于福利国家进行攻击的最大理由就是福利国家过多的财政支出和对财富的再分配影响了人们的投资热情,进而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力。尤其是新经济自由主义者,更以此为理由大规模削减福利,削弱公民的社会权利,这种做法正是把经济增长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的集中体现。它颠倒了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颠倒了经济增长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经济增长工具性质的廓清,不仅是从理念上对市场领域继续扩张的批驳,更有利于限制鼓励市场领域扩张的公共政策的出台,进而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关系,促进良好的公民身份的形成,对于明确福利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人类的实质性自由,这种目的的实现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更与其他非经济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民族国家还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主要形式的情形下,公民身份的良性发展,公民各项权利的实现和各种义务的履行,都与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突破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体系的局限,实现人类由被动权利主体向主动权利主体的转变,进一步培育公民的参与权利,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完善人们对于福利的理解和社会政策目标的确定,将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发展的总体趋向和摆脱困境的有效路径。如果说20世纪是以经济发展为主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以实现国家与公民之间和谐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发展的世纪。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M].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Wł Kymlicka & Wayne Norman: *Return of the Citizen: A Survey of Res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 Theprizing Citizenship* [A]. Edited by Ronalo Bein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转引自许纪霖.共和·社群与公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贻,于真译.刘民权等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吴姚东.当代国外福利测算方法研究——福利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0,(6):57-50.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Policy in the Post- Welfare States

Li Yanxia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Welfare states have been faced with challenges in many aspects. Reform and innovation bring welfare states into a “post welfare” time. In rethinking about social policy, citizenship comes into the eyesight of the policy maker. The crisis of citizenship in the present capitalist countries has brought about m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epitomized by the crisis of welfare states. The crisis of rights and predicament of system embody the inert limitation of modern liberalism. The extending of citizenship has been challenging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liberalism, and will bring about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spects for the social policy in the welfare states.

Keywords: citizenship; right of participation; post- welfare states; social policy

[责任编辑 刘京希]